

國史館館刊
第三十二期（2012年6月），頁121-152
© 國史館

太平洋戰爭前期蔣介石的戰後構想 (1941-1943)

段瑞聰

摘 要

本文從內政和外交兩方面，分析了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至1943年開羅會議結束這一段時期蔣介石的戰後構想。綜觀這一時期蔣介石的戰後構想，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3點特徵：第一，守勢國防與「自強」之夢。蔣介石在日記裡經常流露出對英、美、蘇的不滿，發誓要自強。蔣介石積極主張收復失土與恢復主權，扶持亞洲弱小國家獨立，但是卻三番五次表示不以亞洲領導自居。這令人想起20世紀80年代末鄧小平所提倡的「韜光養晦」外交戰略。由此可以看出20世紀中國外交戰略的連續性。第二，蔣介石有著濃厚的亞洲情結。蔣積極支持亞洲弱小國家獨立，甚至對於戰時加入軸心陣營的泰國，也希望幫助其戰後獨立。對於給中國帶來巨大損失的日本，也主張寬大處理。由此可以看出蔣作為中國領導人的博大情懷。第三，蔣介石在摸索一種獨立自主的全方位外交戰略。蔣介石拒絕與英國單獨結盟，一方面因為蔣對英國不信任；另一方面，他擔心會引起蘇聯嫉妒，也怕影響戰後與德國和日本發展關係。這些無疑都是蔣介石獨立自主外交的具體表現。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蔣介石的戰後構想具有前瞻性。

關鍵詞：蔣介石、憲政、戰後構想、亞洲情結、獨立自主外交

Chiang Kai-shek's Postwar Vision as formed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Pacific War (1941-1943)

Ruicong Duan^{*}

Abstract

This article deals with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s postwar overall framework,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levels, as formed during the period between the eve of the outbreak of the Pacific War in 1941 and the end of the conference in Cairo in 1943. There are three features to be observed in this framework. First, Chiang held a national self-effacement policy in defense and a dream of domestic "self reliance." In his diaries, he often swore to do so, especially the "self reliance", and released his resentments and frustrations toward the British, the US, and the Soviets. Chiang advocated enthusiastically the territorial recovery and sovereignty independence for weak or small nations in Asia, and denied repeatedly the allegation of China's ambition in the area. This reminds one of the "low profile" foreign policy of Deng Xiaoping in the late 1980s, suggesting that there might be a sort of continuity in China's diplomatic strategy. Secondly, Chiang had strong Asian consciousness. He was generous to the postwar treatment of Thailand, and even Japan, China's former enem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Thirdly, Chiang had in mind a grand diplomacy of national independence. He refused to ally with the British, partly for his distrust of them, and partly for his worries about it might have on the relations with the Soviets, Germany, and Japan. In that sense, Chiang's postwar vision was promising.

Keywords : Chiang Kai-shek, Constitutionalism, The vision on China and the world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Asian consciousness, Independent diplomacy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nd Commerce, Keio University, Japan

太平洋戰爭前期蔣介石的戰後構想 (1941-1943)^{*}

段瑞聰^{**}

壹、前言

迄今為止，關於抗日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太平洋戰爭的研究不勝枚舉。但是，關於中國戰後構想的研究並不多見。井上久士和家近亮子都曾探討過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戰後構想。¹但是，二者都將焦點集中在戰後中國內政方面，也就是國共關係方面，而對於戰後世界秩序的形成著墨並不多。另外，松村史紀最近出版一本專著，有系統地分析了美國的戰後中國構想。²

筆者認為，為了加深對中國戰後構想的理解，有必要對當時國民政府最高領袖蔣介石的戰後構想進行分析。具體來說，蔣介石的戰後構想可以從內政和外交兩個方面來分析。內政方面，主要分析蔣介石對於戰後中國政治制度、軍事國防、

^{*} 本文依據 2011 年 11 月 17 日出席香港樹仁大學舉辦的「中國與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時提交的論文改寫而成，並獲得日本公益財團法人稻盛財團資助，特此致謝。撰稿期間承蒙國史館吳淑鳳、高純淑博士協助，暨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卓見，在此一併致謝。收稿日期：2012 年 2 月 20 日；通過刊登日期：2012 年 4 月 11 日。

^{**} 日本慶應義塾大學商學部教授

¹ 井上久士，〈中國の戰後構想——中國國民黨と中國共產黨〉，《近きに在りて》，第 30 號（1996 年 11 月），頁 17-23；家近亮子，〈中國の抗日戰爭と戰後構想〉，收入和田春樹等編，《岩波講座 東アジア近現代通史第 6 卷 アジア太平洋戦争と「大東亞共榮圈」1935-1945 年》（東京：岩波書店，2011 年），頁 151-173。

² 松村史紀，《「大國中國」の崩壊——マーシャル・ミッションからアジア冷戦へ》

（東京：勁草書房，2011 年）。

經濟建設和社會建設等問題是如何構想的。外交方面，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如何扶持亞洲被壓迫民族獨立，另一個就是重建戰後國際秩序的問題。如眾所知，外交是內政的延長，反之亦然。蔣介石的戰後構想與當時的內政以及國際局勢是密不可分的。分析蔣介石的戰後構想及其特徵，不但有助於理解蔣介石個人的政治領導風格，而且有助於理解戰後中國乃至整個世界格局的形成過程。再進一步講，通過分析蔣介石戰後構想中所表現出的政治理念，可以看出 20 世紀中國政治的連續性和非連續性。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利用《蔣介石日記》和《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等新資料，探討太平洋戰爭前期蔣介石的戰後構想及其特徵。由於篇幅所限，本文將時間限定為 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至 1943 年開羅會議結束。因為對蔣介石來說，開羅會議是他「登外交舞臺之第一幕」。³此後，中、美、英、蘇等同盟國陣營的戰後構想，特別是戰後秩序重建以及如何處置日本等問題才正式登上討論日程。

貳、戰後國家建設之構想

一、《中國之命運》的出版與戰後國家建設規畫的具體化

早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蔣介石就開始考慮戰後國家建設。其中，蔣對鐵路建設十分重視。1941 年 2 月 14 日，蔣介石手諭張嘉璈，令其「根據總理實業計畫中之鐵道建設計畫，擬具戰後十年鐵道建設方案」。⁴後來，蔣在日記裡具體記述了他對鐵路建設的構想，希望 1961 年以前完成下列 3 條鐵路：「1. 伊犁、阿克蘇、和闐，至西藏之噶大克之西疆鐵路；2. 與迪化、塔城、承化、科布多、烏里雅蘇台、庫倫至滿洲里之北疆鐵路；3. 由噶大克經翁波、拉薩、太昭、昌都、巴安、中甸、麗江、大理、雲縣、昌都之南疆鐵路。」⁵

³ 《蔣介石日記》，1943 年 11 月 28 日後「上星期反省錄」。本文所引用之《蔣介石日記》，均為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所藏，特此致謝。

⁴ 蔡盛琦主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 45 冊（臺北：國史館，2010 年），頁 511。

⁵ 《蔣介石日記》，1942 年 3 月 14 日後「上星期反省錄」。

1941年7月25日，蔣在日記「預定」欄裡寫到：「戰後建設與救濟機關之籌設」。7月31日，日記「預定」欄裡寫到：「一、戰後收回蒙、新計畫之準備。二、對邊疆政策之確定。」11月20日，日記「預定」欄裡寫到：「戰後善後計畫之準備」。從這些日記可以看出，這個時期蔣的戰後國家建設構想包括交通、善後救濟、邊疆及領土問題。值得關注的是，關於領土問題，蔣這個時期主要關注的是外蒙和新疆。

1941年12月8日，日本海軍偷襲美軍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蔣介石得知後，在當天日記中寫到：「本日抗戰政略之成就已達於巔點」。第二天，國民政府正式對日、德、意宣戰。蔣介石認為這樣就可以「對俄對英對美皆有發言之地位。」⁶而且，蔣認為「此次世界戰局，必為一整個之總解決，斷不容分別各個之媾和，否則雖成亦敗矣」。可以說，太平洋戰爭爆發，加速了中國與美、英、蘇軍事合作的進展。

對日、德、意宣戰之後，蔣介石馬上開始考慮如何與美、英、蘇成立同盟，他認為「同盟國總機關應設在華盛頓」。⁷蔣主張儘快成立同盟，不僅僅為了打敗日本，更重要的是想借機收復領土與恢復主權。12月20日，蔣在日記中寫到「各國同盟條約必須附帶政治與經濟條件在內：甲、對英要求其承認西藏、九龍為中國領土之一部；乙、對俄要求其外蒙、新疆為中國領土之一部；丙、東四省、旅大、南滿要求各國承認為中國領土之一部；丁、凡各租借地及治外法權與各種特權及東交民巷皆須一律交還中國與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特別是蔣認為「對新疆與西藏問題，應乘世界戰爭期間解決為便」。⁸12月21日，蔣在日記中又寫到：「對內最應研究者：甲、新疆；乙、共黨；丙、青海；丁、閩事；戊、政治建設；己、東北共黨之防備。」在此值得關注的是，蔣這時就已經注意到要防備共產黨在東北的發展。

1942年以後，蔣介石對戰後國家建設的構想逐漸具體化。他在日記「民國三十一年大事表」裡寫到：「對共黨與新疆政策及其進行步驟之決定」，「收復西

⁶ 《蔣介石日記》，1941年12月9日。

⁷ 《蔣介石日記》，1941年12月14、19日。

⁸ 《蔣介石日記》，1941年12月29日。

藏主權之準備」。在 1942 年 1 月日記「本月大事預定表」裡也寫到：「對各黨派方針之研究」、「新疆、西藏收復之計畫」、「華北與東北收復軍事之準備」、「戰後復員計畫之研究」、「戰後建設總方案」、「國防十年計畫之研究」等等。

1942 年 3 月 13 日，蔣在日記中寫到：「以後我國局勢，西北重於西南，對內重於對外，整軍重於作戰，經濟重於政治也」。他認為「西北之後患與西北之國防當為戰後第一要務，此題不能解決以前，則一切皆難生效也。」⁹蔣在這裡所說的「西北之後患」無疑是指延安的共產黨。而其「西北之國防」的假想敵則是蘇聯。

1942 年 9 月，蔣介石確定了邊疆政策方針，即「甲、建設甘肅；乙、穩定寧青；丙、鞏固西康；丁、調整新疆；戊、控制西藏；己、溝通外蒙」。¹⁰ 12 月 15 日，他在日記中寫到：「戰後急要建設；1. 國防工業；甲、煤鐵；乙、機械；丙、電化；2. 國防經濟；甲、交通鐵路飛機船艦；乙、棉花米麥水利造林；丙、金融貿易鋼產、汽油等國防工業。此時不僅急於設計，而且必須儲備人才，擬將其甲、乙、丙三種，各指定一專校，令其一面培植人才（已成者收為教員），一面準備具體實施計畫，而以政治學校為其總設計配合之中心也。」

蔣介石的國家建設構想，最終被納入《中國之命運》一書中，¹¹ 於 1943 年 3 月公諸於世。關於此書，以往研究多從國共關係的角度來分析；¹² 其實，該書可以說是蔣介石戰後構想的具體化。¹³

⁹ 《蔣介石日記》，1942 年 3 月 28 日。

¹⁰ 《蔣介石日記》，1942 年 9 月 19 日後「本星期預定工作課目」。

¹¹ 《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 4 卷（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 年）。

¹² 鄧野，〈蔣介石關於《中國之命運》的命題與國共的兩個口號〉，收入氏著，《民國的政治邏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年），頁 192-214。

¹³ 1943 年 1 月 9 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到：「中國的命運之要旨：1. 勸勉國民恢復我國固有之道德（文化）與技能；2. 鼓勵國民建國之信心與決心；3. 復興漢唐之規模與氣魄。」可以說這是蔣介石出版《中國之命運》的初衷。另外，同年 4 月 13 日，蔣又在日記中寫到：「中國之命運中第七、第八章皆未明提共產主義與中共，留其悔悟與旋回之餘地，此乃文字含蓄之效也。」由此可知，蔣當初出版《中國之命運》時並不想與中共發生正面衝突。

1943年1月11日，中美新約和中英新約分別在華盛頓和重慶簽訂，從此英、美兩國在華不平等特權完全撤銷。蔣介石指出，「撤廢不平等條約，是國民革命初步的成功」。¹⁴而「國民革命的初步成功，即為建國工作的開始」。蔣認為「中國的建國工作有國內的與國際的兩方面。在國內方面，中國惟有取得獨立自由的地位以後，才能夠實現政治建設與經濟建設的理想。換句話說，革命建國的工作，是由民族主義的完成，到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的實現」。

蔣介石指出：「國父革命建國的程序，為三個時期——軍政時期，訓政時期和憲政時期，而貫通於三個時期的基本工作，在於教育、軍事與經濟」，¹⁵「必須先求教育、軍事與經濟的合一，方得完成國家整個的建設」。關於教育，蔣主張要根據「六藝」教育的精義，訓練國民，使每一個國民都能致力於生產，獻身於國防。關於經濟，是指在獲得獨立自由的基礎之上，使國民經濟平均發展。關於軍事，就是「國防與文化必期於合一，而國防與民生，亦必凝為一體」。蔣認為，只有這樣，「中國才能夠成為堅強的民族國防組織，以自存於世界，並盡其保障世界和平共求人類解放的責任」。

為了完成建國的基本工作，蔣指出必須從心理建設、倫理建設、社會建設、政治建設與經濟建設五個方面入手，「制定周詳的方案，而使之實踐力行」。關於這五大建設之間的關係，及其與教育、軍事和經濟的關係，蔣做出了如下的解釋：

我們要改造百年來次殖民地破碎偏枯的經濟，而為獨立自由的經濟，且期於適合國防之所需，則必以政治的力量轉移經濟發展的趨勢。我們要政治建設健全而有效，則必須社會建設，能為政治設施作切實的基礎。至於社會建設的成功，又必須改變國民過去消極和被動的心理，與提高國民對國家和民族的道德。故心理建設與倫理建設，實為各項建設的起點。五項建設有效，方能使教育、軍事與經濟合一的建國工作成功。

¹⁴ 《中國之命運》，《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4卷，頁77。以下內容主要參照該文第5章。

¹⁵ 早在1935年，蔣介石就指出教育、經濟和武力為現代國家三大生命力。參見蔣介石〈現代國家的生命力〉，《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13卷，頁404-418。有關這一時期蔣介石的國家建設理念，參見段瑞聰，《蔣介石と新生活運動》（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06年），第4章。

有關五項建設的構想，最早出現於 1939 年 5 月 7 日蔣介石在中央訓練團所做的演講〈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行政序〉。¹⁶ 蔣在《中國之命運》裡對五項建設重新作了解釋。

關於心理建設，蔣指出「應以獨立自主的思想運動為基礎。而其最重要的條目，則為發揚民族固有的精神，講求科學真實的智識」。所謂民族固有的精神是指「智、仁、勇」三達德，和「誠」。蔣認為這些「實為我民族德性的結晶」。蔣指出孫中山所著心理建設——《孫文學說》是心理建設最寶貴的指針，獨立自主的思想運動必須以此為準則。

關於倫理建設，蔣指出今後「應以培養救國的道德為基礎」。最主要的是「發揚我國民重禮尚義，明廉知恥的德性。這種德性，即四維八德之所由表現。而四維八德又以『忠孝』為根本」。

關於社會建設，蔣指出「新生活運動¹⁷是社會建設的基本運動，其目的在求中國國民之『現代化』。國民惟有現代化，才配做獨立自由的國民。國民能做獨立自由的國民，國家才能成為獨立自由的國家」。基於此，蔣認為「新生活運動可以說是五項建設的總運動，應為今後社會建設的基礎。而其最重要的條目，則為地方自治的訓練，與公共之『樂』與『育』的設施」。

關於政治建設，蔣指出今後「應以國民奮發自主自動的精神為基礎，而最基本的項目為培植民主制度與健全國防體制」。關於民主制度，蔣指出「決不以歐美 19 世紀個人主義與階級觀念的民主制度為模型。我國政治的建設必須樹立五權憲法與全民政治的基礎」。我們從蔣的這一觀點可以看出 20 世紀中國領導人對西方民主制度認識的連續性。那就是無論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都拒絕全盤引進西方的民主制度。

關於經濟建設，蔣指出今後「應以發達工業經濟為基礎。其最重要的條目，為準備實業計畫的實施，由此以完成我們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的基本政策」。蔣

¹⁶ 〈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行政序〉，《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 3 卷，頁 135-155。

¹⁷ 參見段瑞聰，《蔣介石と新生活運動》（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06 年）。

認為孫中山的「實業計畫」為經濟建設的惟一寶典。為了實現實業計畫所定的業務，蔣認為「首先要有實行實業計畫的人才和完成實業計畫的物資」。蔣在《中國之命運》裡列舉了實行實業計畫最初 10 年內所需要的人才與物資。具體有土木、機械、電機、空運、水利、建築、衣服、衛生、礦冶等領域。蔣認為「實業計畫的全部完成，要積三十至五十年之久」。

讀《蔣介石日記》，隨處都可以看到他對人才不足的慨歎。所以，蔣十分重視戰後人才的培養。1943 年 6 月 6 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王世杰約組織部長陳果夫、熊式輝商議培植戰後建設人才辦法。商議結果為應該利用英、美借款，大規模派遣員生赴英、美留學或實習。¹⁸ 王世杰計畫向蔣介石建議 1943、1944 年派 3 千人赴英美留學，注重實科。此後，國民政府遂決定 1943 年派遣 1,200 人赴英、美、加拿大研習實科。¹⁹

1943 年 8 月 1 日，蔣在日記中寫到：「戰後各種急務人才之準備；甲、接收東北敵寇工廠，與礦場鐵路之人才；乙、接收敵寇海軍人才；丙、接收租界人才，丁、司法與外事員警之準備；戊、西藏新疆外蒙東北軍政人才之準備。」

當時，戰後經濟建設政策之制定主要由中央設計局²⁰擔任。截止 1943 年 7 月下旬，中央設計局擬定之復員時期計畫有「法幣整頓計畫」、「吸收外資計畫」、「國營民營範圍劃分計畫」、「銀行制度改革計畫」、「退伍士兵屯墾計畫」、「水利復員計畫」等。²¹由於篇幅所限，本文不對這些計畫之內容與特徵進行詳細分析。在此，僅以蔣介石對憲政與國防的認識為例，探討其戰後構想的主要內容及其特徵。

¹⁸ 《王世杰日記》，第 4 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年），頁 85。

¹⁹ 《王世杰日記》，第 4 冊，頁 135。

²⁰ 參見張希哲，〈記抗戰時期中央設計局的人與事〉，《傳記文學》，第 27 卷第 4 期（1975 年 10 月），頁 39-44；周開慶，〈記中央設計局物質建設五年計劃草案〉，《傳記文學》，第 27 卷第 5 期（1975 年 11 月），頁 71-72；劉維開，〈國防最高委員會的組織與人事初探〉，收入胡春惠主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香港：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心，1996 年），頁 286-289；劉維開，〈國防最高委員會的組織與運作〉，《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 21 期（2004 年 5 月），頁 152-155。

²¹ 《王世杰日記》，第 4 冊，頁 114-115。

二、憲政實施之準備

1939 年 9 月 9 日，在重慶召開的第一屆國民參政會第四次會議通過了「召集國民大會實行憲政決議案」。12 日，蔣在日記中寫到：「憲政應提早實施。本黨新老黨員落伍，而老黨員為尤腐朽。若不還政於民，誠誤國而又誤黨矣。」由此可知，蔣對憲政問題的關注與其對國民黨的失望有關，希望借實施憲政之機，以「還政於民」的姿態，來擺脫來自「腐朽」的老黨員的掣肘。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蔣在考慮憲政問題時最為憂慮的是共產黨問題。1943 年 3 月 27 日，貴州省主席吳忠信建議蔣介石在戰時頒布憲法，一俟戰事完結，即開始實行憲政，蔣介石認為「當重加研討」。²² 但是，7 月 13 日，蔣介石約國民參政會駐會委員商討訪英團組織，席間蔣突然提出憲政可提前實施，但是要以軍令政令之統一為條件。²³ 8 月 1 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去世。蔣介石決定自己繼任國民政府主席。關於其理由，蔣在日記中寫到：「林主席逝世以後，國府主席不得不自兼此職，否則，內部又生意見。以不能互讓與互尊是為今日社會與國風最大之惡習。如何使之改正，以期共同救國也？決心明年雙十節召集國民大會，頒布憲法，結束訓政時期。」²⁴

關於行憲時期，國民黨內意見並不統一。王世杰認為，如果定為戰事結束 6 個月內召集制憲大會，亦不為晚。²⁵ 而國民黨高層則多數主張明定於戰後一年內制憲並實施。9 月 3 日，蔣介石在重慶黃山官邸與王世杰商討憲法及共產黨問題。王世杰主張憲法之公布與國民大會之召集在戰時不能草率舉行，必須於戰後 6 個月至 1 年之內進行。²⁶

9 月 6 日，國民黨五屆十一中全會在重慶開幕。這是一次很重要的會議。以

²² 《蔣介石日記》，1943 年 3 月 27 日。

²³ 《王世杰日記》，第 4 冊，頁 108。

²⁴ 《蔣介石日記》，1943 年 8 月 1 日後「上星期反省錄」。

²⁵ 《王世杰日記》，第 4 冊，頁 125-126、132。

²⁶ 《王世杰日記》，第 4 冊，頁 141。

往的研究，多關注國民黨在這次會議前後對共產黨的對策。²⁷ 但是，筆者認為，這次會議還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這是一次團結性會議。新疆省主席盛世才、雲南省主席龍雲第一次參加全會。蔣介石對此頗為滿意，他在日記中寫到：「新盛滇龍應召到會，此為民國以來未有之盛事，可知國家與中央之威聲比之十二年前不啻提高倍蓰矣。」²⁸ 蔣認為「此實使內政與人心皆為之一振，表示我內政已完全統一之象徵，封建勢力之消失，亦可知矣」。²⁹

第二，蔣介石正式宣布要實施憲政，還政於民。蔣在開幕詞³⁰裡首先指出抗戰最後勝利的時期，「快則就在一年之內，遲則或要在一年之後」。所以，「一面加強抗戰的力量，一面積極準備建國的工作，這是此次全會最重要的任務」。蔣指出建國工作「第一要緊的就是要先確立我們的政治建設，而政治建設的基礎，就在憲政的實施」。「所以此次全會對於國民大會應如何召集，以及憲法的制定與頒布應如何進行各問題，必須根據國家實際環境與需要，作成一個確切的決議」。蔣強調指出，實施憲政以後，國民黨還政於民，「在法律上本黨應該與一般國民和普通政黨處於同等的地位，在法定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自由的原則之下享同等的權利，盡同等的義務，受國家同等的待遇」。可以說，這是蔣介石對放棄一黨專政的重大表示。

9月8日，十一中全會通過「關於實施憲政總報告之決議案」，³¹ 決定「於戰爭結束後一年內，召集國民大會，制定憲法而頒布之，並由國民大會決定施行日期」。9月17日，張君勱、左舜生向王世杰建議由國民政府與國民參政會共同成立憲政籌備機關，吸收黨外人員，共同討論推進關於言論、結社自由之開放以

²⁷ 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頁483；鄧野，《民國政治的邏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頁161-165。

²⁸ 《蔣介石日記》，1943年9月5日後「上星期反省錄」。但是，閻錫山未赴會。關於抗戰後期之新疆，參見王建朗，〈試論抗戰後期的新疆內向：基於《蔣介石日記》的再探討〉，《晉陽學刊》，2011年第1期。

²⁹ 《蔣介石日記》，1943年9月「本月反省錄」。

³⁰ 《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20卷，頁259-264。

³¹ 榮孟源主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下冊（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年），頁844。

及民選機關等問題。³² 王世杰徵求蔣介石意見，蔣表示原則上可以接受此意。

9 月 18 日，第三屆國民參政會第二次大會開幕。蔣介石親自出席參政會，提出將組織「憲政實施籌備會」，以推動憲法籌備工作。³³ 10 月 10 日，蔣介石就任國民政府主席，發表了「告全國軍民同胞書」。³⁴ 蔣在告書中明確提出了今後的奮鬥目標。即「對內要促進全國的地方自治，鞏固國家的統一，確立法治規模，完成民主政治；對外則敦睦同盟友邦，爭取反侵略戰爭光榮的勝利，共策戰後世界永久的和平。更以自力更生與國際合作，開發我廣大豐厚的資源，實現經濟建設，增進人類的幸福，期成世界大同之治」。

10 月 25 日，國防最高委員會第 122 次常務會議決定成立憲政實施協進會。³⁵ 11 月 12 日，憲政實施協進會正式成立。蔣介石在開會詞中就該會的工作要旨，提出三點指示。第一，「宣揚憲法草案的精義與徵集對於憲政問題的意見」；第二，「考察各級尤其是縣級民意機關設置情形，隨時提出報告」；第三，「研究如何增進法治與自由的精神，以期發揚民意，奠定民治的基礎，早作由戰時而進於戰後的準備」。³⁶ 1944 年元旦，憲政實施協進會開展全國人民研討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五五憲草）等活動，為新憲法之制定奠定了基礎。³⁷

三、守勢國防與定都西安之構想

1942 年 9 月 13 日，蔣介石研究國防計畫，在日記中寫到：「中國應以天山與崑崙山為西部國防之鎖鑰，而以阿爾泰山與希馬拉耶山為其屏藩（外衛），東部以鴨綠江與黑龍江為國界，而以長白山與內外興安為鎖鑰。即東以山海關外東三

³² 《王世杰日記》，第 4 冊，頁 153-154。

³³ 《王世杰日記》，第 4 冊，頁 161。

³⁴ 《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 32 卷，頁 42-46。

³⁵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 4 編戰時建設（二）》（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8 年），頁 1781-1782。

³⁶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 4 編戰時建設（二）》，頁 1787-1790。

³⁷ 〈憲政實施協進會工作報告〉，收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 4 編戰時建設（二）》，頁 1791-1793。

省爲東花園，西以玉門關猩猩峽外新疆、西藏爲西花園。即以新疆爲我國前門之廣場，而嘉峪關實爲中華東西緯線之中心也。」從這則日記可以看出蔣對戰後國防構想的大致輪廓。

至 1943 年 8 月，蔣介石之國防建設構想逐漸明朗。8 月 10 日，他在日記中寫到：「建設政策，先完成內地，對邊疆應在最後之五年一氣呵成，故建設內地即爲籌備邊疆之準備，況是以後守勢國防之宗旨亦重在內地爲軸心。只要內地之軸心強健，則俄國即不敢在邊疆侵佔挑釁，以空間與交通皆不能直攻我腹心，此次倭寇侵華之教訓，彼必能深刻領受乎。」由此可知，蔣所設計的國防建設是以蘇聯爲假想敵的。

具體來說，蔣介石的國防建設程序如下：「戰後五年至十年以內，應注全力於本部內地之工農業與交通水利之建設，先將西南與東南國際通海路線完成，不患後方與本部交通之阻絕，而後再從事于西北之建設，且於第三之五年計劃中，將新疆與青海全部鐵路一氣呵成，使俄國猝不及防。故戰後最初五年～十年之中，一面不使俄國對我防備，一面充實本部建設，即爲西北國防建設之準備也。蓋戰後二十年之內，如有外患，則我必取守勢，仍欲引敵至我內地決戰爲唯一戰略，而且只要我內地本部建設與防務堅強，則各方外患，即不敢對我輕啓戰端也。至於東北收回後，則維持其原有之工業與國防，總不使俄國戒懼爲第一要義。戰後必以我東北工業之餘力，以充實我本部之建設，自爲第一之設計也。」³⁸

1943 年開羅會議以後，蔣介石分析今後國防之重點，在日記中寫到：「1. 以大陸爲國防之基礎；2. 西北爲國防之重心，故對海防與海軍應取守勢，並與美國共同合作，且避免與美有軍備競爭之趨向。以我爲大陸國，發展方向不在海上，而且亦不能與之競爭，亦無競爭之必要也。此在我立國大計基本之方針，應首先決定。故今後國防方針與國際政策，必須與美積極合作及互助，萬不可與美作海洋競爭。余在開羅會議以後，更證明此旨爲正確而不謬也。如果國際武力不能獲得和平之保障，余意在太平洋方面，中國負陸空軍之責，而美國負海空軍之責。如美國能同意於此，則東方和平或可無慮乎。」³⁹

³⁸ 《蔣介石日記》，1943 年「雜錄」，8 月 15 日。

³⁹ 《蔣介石日記》，1943 年「雜錄」，12 月 7 日。

由於蔣介石主張守勢國防建設，所以戰後首都之所在也受到影響。1943 年 8 月 1 日，蔣在日記中寫到，「首都地點問題，應以將來國防目的敵與武器兵種性類爲主旨，其他經濟與地理、氣候、人口亦爲要素。以兵種而論，我國海岸線之長與幅員之大，陸海空三軍仍不可缺一，然應有先後之分。自以陸空爲先也，故南京與北平皆近海，最初卅年必不能建立強健之海軍爲之掩護，則首都地點不能不在西安。以其地適中于東北與西北之間，控置全國，而且爲中國最盛時代之舊都也」。

9 月 3 日，蔣介石再次從國防的角度，考慮將首都定于西安的必要性。蔣在日記中寫到：「國防中心必在四川，先使東北與四川之水陸交通發展爲第一義。首都當在西安，以其對東北至同江，對西北之伊犁之距離相等，而且其北至庫倫與南至瓊州之距離亦相差無幾，況是關中沃野千里，有高峻之南山與直通大河之渭水，其緯度則在三十五度，無論氣候、地理與經濟之條件無不具備。將來黃河修浚以後，當使輪船直入渭水或至潼關，則水陸交通更完備矣。此中華民族發祥之古都，實爲我民族復興天然之基地。又以天府四川爲其後方，是欲另覓一首都，如西安者，現在再無如此適宜之地矣。」此時，蔣似乎忘卻了西安事變曾經帶給他的創傷。

叁、「太平洋憲章」之構想與扶持亞洲被壓迫民族之獨立

1941 年 8 月，英、美首腦會晤，發表「大西洋憲章」，其第三條強調指出「尊重各民族自由，決定其所賴以生存之政府形式之權利，各民族中此項權利有橫遭剝奪者，俱欲使其恢復原有主權與自主政府」⁴⁰。但是，同年 9 月 9 日，邱吉爾在議會演說中表示「大西洋憲章」之主要目的在恢復歐洲被納粹征服各國之主權，同時邱吉爾還表示該憲章並不影響英帝國對於印度及緬甸之政策。⁴¹ 蔣介石

⁴⁰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 3 編戰時外交（三）》（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 年），頁 793-794。

⁴¹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3編戰時外交（三）》，頁796。

則希望「大西洋憲章」能適用於全世界，特別是希望戰後亞洲被壓迫國家能夠獨立。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蔣介石首先考慮的是要收回領土，廢除不平等條約。蔣介石積極主張收復領土，恢復民族固有地位，不僅僅是為了中國本身的獨立與自由，他希望以此為「解決亞洲各民族之張本，使之皆得平等自由」。⁴²由此可以看出蔣介石的亞洲情結。

蔣介石以幫助亞洲各民族獨立為己任。1942 年 2 月出訪印度，希望英國同意印度戰後獨立。⁴³同年 3 月 21 日，他在日記中寫到：「力求解放亞洲各民族為我今後惟一之責任，亦惟有此，方能在和會中得優勢耳。」由此可知，蔣介石幫助亞洲各民族獨立，是希望獲得這些國家的支持，以便在戰後和會中獲得優勢。

1942 年 2 月，蔣介石訪問印度以後，援助亞洲被壓迫民族獲得解放的使命感更加強烈。3 月 18 日，蔣在日記裡寫到：「太平洋大憲章，凡亞洲各民族應予獨立平等之宣言。」4 月 23 日，日記中寫到：「太平洋憲章與大東亞新秩序之對策研究。」5 月 30 日，日記裡寫到：「太平洋大憲章之研討」。6 月日記「本月大事預定表」裡寫到：「太平洋大憲章之擬議」。從以上日記可知，這段時期蔣介石在考慮制定「太平洋憲章」，以推動亞洲各民族獨立。

蔣介石令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王寵惠研究太平洋憲章問題。⁴⁴1942 年 7 月 7 日，王寵惠將研究報告呈送蔣介石，王在報告中指出「大西洋憲章」適用於太平洋有兩個缺點。第一，「大西洋憲章」第二條規定：「凡未經有關民族自由意志所同意之領土改變，兩國（英、美，筆者注）不願其實現。」王寵惠認為「此僅為一種消極的民族自決，今日太平洋沿岸殖民地甚多，吾人切望於大戰以後，根據民族自決原則，作積極之調整」。第二，「大西洋憲章」第六條規定：「待納粹之專制宣告最後之毀滅後，希望可以重建和平。」這裡的「納粹」是指德國和義大利。當時日本尚未對英、美宣戰，所以沒有提出以日本為對象。1942 年 1

⁴² 《蔣介石日記》，1942 年 3 月 14 日後「上星期反省錄」。

⁴³ 參見段瑞聰，〈1942 年蔣介石訪問印度之分析〉，《民國研究》，總第 16 輯，2009 年冬季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北京，2009 年 12 月），頁 125-145。

⁴⁴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 3 編戰時外交（三）》，頁 796-798。

月簽署的「聯合國共同宣言」裡，由於蘇聯沒有對日宣戰，所以僅提出「戰勝希特勒主義」，也沒有提及日本。基於以上理由，王寵惠建議「不採取『太平洋憲章』方式」，而是擬具了「補充大西洋憲章聯合宣言」，作為「大西洋憲章」補充條款，建議在適當時期向英、美提議。宣言共由以下三條組成：一、「大西洋憲章」尤其是關於各侵略國武裝解除及各國與民族自決等原則，一律適用於全世界；二、日本之領土應以其 1894 年發動侵略政策以前之範圍為準；三、各民族及各種族一律平等，為世界和平與進化之要素。

關於第一條，王寵惠指出「英、蘇態度雖不可知，但美國之贊助當不成問題。解除各侵略國武裝一點，雖未明指日本，但既適用於全世界，日本當然在內」。關於第二條，「意在使日本退還甲午以後所有侵佔各國（包括蘇聯在內）之土地」。但是，由於蘇聯與日本尚保持和平關係，王寵惠擔心蘇聯也許會不同意，所以他建議「必要時亦可刪除」。關於第三條，王指出：「種族平等原則，為《大西洋憲章》所無，能否成功，當視英、美兩國之態度為轉移。」

此後，在蔣的日記中沒有再出現過「太平洋憲章」的字樣。但是，蔣幫助亞洲國家獨立的理想始終沒有放棄。1942 年 11 月 9 日，蔣介石在日記中記載對美商討事項，其中就有「安南共扶」、「泰國仍予獨立」、「印度戰後獨立」、「緬甸與南洋各國共扶」等內容。⁴⁵ 蔣介石希望在美國的支持下，使其得以實現。

蔣介石之所以如此熱衷於強調亞洲國家獨立，與他的反帝意識有密切關係。⁴⁶ 另外，羅斯福的支持也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1942 年 6 月 1 日，宋子文拜見羅斯福。羅斯福告知其與莫洛托夫談話內容。⁴⁷ 羅斯福「主張各弱小民族應自決自主，如有某國如越南、緬甸等民族不能即刻自主，也當有集團 trustee，不能再有

⁴⁵ 1942 年 11 月 17 日即宋美齡赴美前日，蔣在日記中寫到：「下午與妻到聽江亭廊前，談對美總統談話要領十項。」基於此，筆者認為 11 月 9 日日記所記 10 項內容乃蔣當時為宋美齡起草的與羅斯福的談話要點。

⁴⁶ 蔣介石重視亞洲國家獨立，與中國傳統對外關係中的「濟弱扶傾」、「以大事小」等觀念有關。此點感謝匿名審查人惠賜卓見。

⁴⁷ 吳景平、郭岱君編，《宋子文駐美時期電報選（1940-1943）》（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 年），頁 161。

殖民地」。羅斯福建議「蔣委員長有便可發表此主張，以獲亞洲人民同情」。在反對殖民統治方面，羅斯福與蔣介石的意見是一致的。羅斯福希望借助蔣介石的力量，給英國施加壓力。

但是，由於蔣介石高度重視戰後亞洲國家的獨立，引起一部分美國人反感。1942 年 8 月 4 日，蔣介石接見居里（Lauchlin B. Currie, 1902-1993），居里指出：「美國今有一部分人感覺戰後之中國將為軍國主義而排除白種人之國家，故彼等持養虎貽患之戒心。」⁴⁸居里建議「中國欲消除美國此種心理，最妥辦法，應逐漸向民主主義推進，勿作排外之表示，應用『中國為亞洲之領導』等字句，尤應小心」。

受到居里之建議，此後蔣介石多次表示不以亞洲領導自居。1942 年 10 月 29 日，蔣介石出席第三屆國民參政會第一次大會時講到：「因為我們中國國民革命，最終目的，是在求世界民族一律平等，不是和現在軸心國家一樣，有了武力就以領導者自居，壓迫其他的弱小民族，作他的奴隸，這種侵略主義的思想，必須打破。」⁴⁹10 月 31 日，蔣在參政會閉幕式上再次強調指出：「對於戰後世界秩序的再造，我們應站在求進步爭自由的正義立場之上，與聯盟各國共同負起解放全世界人類的大責任。我們中國為亞洲最大最古之國，但我們決不要侈言什麼『領導亞洲』。」⁵⁰11 月 17 日，蔣介石在《紐約先驅論壇報》發表專文，表示中國「對亞洲沉淪的國家自表無限的同情，但對此種國家的自由與平等，我輩只有責任，並無權利，我輩否認將為領導者」。⁵¹11 月 25 日，蔣介石在國民黨中央五屆十中全會上，再次重申中國不擬以東亞領導者自居，並反對任何帝國主義。⁵²

蔣介石之所以三番五次表示無意作亞洲的領導，是為了消除英、美對中國的

⁴⁸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 3 編戰時外交（一）》，頁 703。

⁴⁹ 《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 19 卷，頁 347。

⁵⁰ 《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 19 卷，頁 353。

⁵¹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 5 卷（上）（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78 年），頁 237。

⁵² 《王世杰日記》，第 3 冊，頁 396。

不信任。這一點，從他下面的日記裡也可以看出。「自余否認領導亞洲之政策在美報發表以後，英、美對我之心理與觀念全變，皆一致表示好意。而《紐約時報》則自認其美、英對華有在戰後建立平衡力量，不使中國在亞洲獨自強大，成為世界新威脅之意念，可知美國對我之防範顧忌不亞於英國，而子文昔以爲美國無此顧忌，是其太不懂美國對（我國與）太平洋獨霸之政策矣，而其來華之軍官對中國之輕視與把持之狀態，更可知矣。後之來者，應知今日忍辱含垢之情景，不可不加奮勉，力求自立與自強。」⁵³ 1943 年開羅會議時，蔣介石放棄收回琉球，拒絕羅斯福讓中國負責占領日本的要求，都是爲了不引起美國的懷疑。

肆、重整戰後世界秩序之謀劃

一、籌劃世界和平會議

蔣介石從 1941 年 5 月底就開始考慮籌備戰後和會問題。5 月 30 日，蔣在日記「預定」欄裡提及「將來世界和平會議之籌備」。次日，蔣又在「本星期預定工作課目」裡面提醒自己要注意：「國際和平會議之籌備主任人選」。6 月 7 日、10 日後所附的「本星期預定工作課目」和「預定」欄裡都提到「和平會議之準備」。

蔣關於戰後和平會議的構想，主要基於他對當時國際形勢的判斷。7 月 17 日，蔣在日記中寫到：「時至今日，倭寇已非單獨解決中國問題，或僅征服中國所能達成獨霸遠東之目的。美、英、蘇俄在遠東實力，對倭已完成包圍之勢。故其此後作戰目標，必轉移於俄美，而不在中國。四年抗戰險阻艱辛，堅持至此，已使敵國戰爭目標不能不完全改變，而我國危險亦可說脫出大半。」基於這樣的判斷，蔣介石開始考慮要促成中、美、英、蘇軍事合作，以「使我國在世界戰爭中與和平會議中皆列于戰鬥員正式之列」，「而不被遺棄」。⁵⁴ 具體來說，蔣介石希望以美國爲中心，促成中、美、英、蘇之間的軍事合作。

⁵³ 《蔣介石日記》，1942 年 11 月「本月反省錄」。

⁵⁴ 《蔣介石日記》，1941 年 7 月 9 日；1941 年 7 月 12 日後「本星期預定工作課目」。

蔣介石之所以如此器重美國，是因為他認為「只有美國對華無侵略之野心」。⁵⁵ 正因為如此，蔣介石早在 1939 年就對美明白表示，如果美國能協助中國抗戰勝利，則中國以後建立海空軍以及海港，皆可與美國訂立 20 年共同使用之協約。因為蔣介石認為，「我國如欲建立海空軍，論人才、物力與技術，皆非此不可」。

但是，蔣介石並非完全信任英、美。1941 年 4 月以後，日、美官方談判開始。蔣介石得知後，一直關注事態的發展。5 月 20 日，他在日記中寫到：「美國始終想與倭寇妥協，白人皆視黃人爲玩具，可痛。以美國對英之熱情與其對華之比較，豈啻血濃於水而已哉。」當時，中國希望美國提供飛機，但是美國遲遲不肯明確表態。對此，蔣深表不滿，他在日記中寫到：「美國對我之不注重，其較對法國猶不如也。此血濃於水之理，白人任何政治家之心內皆同乎。」⁵⁶ 由此可以看出蔣介石的黃白人種鬥爭意識。

蔣介石的黃白人種鬥爭意識從他對「大西洋憲章」的評價也可以看出。1941 年 8 月，羅斯福與邱吉爾在大西洋北部紐芬蘭會晤，14 日正式發表了「大西洋憲章」。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兩國首腦首次會晤，而「大西洋憲章」可以說是英、美兩國最初的戰後構想。蔣介石得知後，在日記中寫到：「英、美聯合宣言不單提歐戰而包括世界及遠東，此固進一步之形勢。然獨對援俄提及而並未及華，此乃白人傳統之觀念，總以黃人爲不能與之平等也，可痛。」⁵⁷ 此後，蔣介石的黃白人種鬥爭意識一直縈繞在他的心頭，對他的外交政策產生很大影響。⁵⁸

蔣對英、美的不滿還有來自現實的因素，即英、美的對日綏靖政策。1941 年 8 月 20 日，蔣在日記中寫到：「英、美政府心理與其處置，最近可謂卑陋已極。其對倭日之姿勢，不使倭南進攻泰國，亦不許倭北進攻西伯利亞，而僅希望其維持現狀，就是使倭不南侵北略，而專打中國，使黃種人自相殘殺。揆其用心，就是聞倭進攻中國則喜，不攻中國則憂。因為倭攻中國才無力南進與北略，以免太平洋上生事。彼以爲倭打中國就是維持現狀，維持現狀即等於和平。無論英、美、

⁵⁵ 《蔣介石日記》，1941 年 10 月「本月反省錄」。

⁵⁶ 《蔣介石日記》，1941 年 6 月 16 日。

⁵⁷ 《蔣介石日記》，1941 年 8 月 17 日。

⁵⁸ 參見段瑞聰，〈1942 年蔣介石訪問印度之分析〉。

俄，對倭對華，其心理與政策根本皆無二致。彼等不僅以華爲壑，而且賤視有色人種，必使之自相殘殺，以達其白人永久稱霸世界之政策，乃並無差異。何怪日爾曼民族之不安耶。民族未有不自強而能被人重視或能不被人犧牲者也。亦惟求其在我，何足爲憾。」⁵⁹

從以上記述可以看出，爲了打敗日本，在戰後和會獲得一席之地，蔣介石很想與美、英、蘇打成一片。但是，其內心對英、美、蘇卻充滿不信任，因而一直強調要自強。可以說，蔣介石處於一種兩難的境地。而這種情況直到戰後也沒有改變。⁶⁰

二、拒絕與英國單獨結盟

1942年1月1日，美、英、蘇中等26國簽署「聯合國家宣言」（Declaration by the United Nations），中國成爲四強之一。但是，蔣介石卻覺得「甚恐名不符實，故更戒懼不勝」。⁶¹因爲，蔣介石認爲「聯合國中之四國，以我爲最弱。甚以弱者遇拐子、流氓與土霸爲可危也」。⁶²這裡的「拐子」無疑是指羅斯福，「流氓」應是指邱吉爾，而「土霸」則是指史達林。蔣對羅斯福等人的戲稱，從人性的角度來說，確爲不妥。但是，如果從四國的實力來看，蔣的話不無道理。蔣對「四強」實力的認識，影響了他的外交政策和戰後構想。

1942年5月下旬，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應邀訪英，簽訂了有效期爲20年的「英蘇同盟合作互助條約」。蔣介石得知後，在日記中寫到：「英俄同盟條約正式發表，其中注重之點：甲、不擴張領土；乙、不干涉其他國家內政；丙、承認大西洋憲章，此皆于我有利也。」⁶³但是，英國外相艾登在英蘇同盟成立時發表

⁵⁹ 《蔣介石日記》，1941年「雜錄」。

⁶⁰ 段瑞聰，〈蔣介石の第三期國民革命中心理論〉，慶應義塾大學日吉紀要《中國研究》第4號（2011年3月），頁139-168。

⁶¹ 《蔣介石日記》，1942年1月3日後「上星期反省錄」。

⁶² 《蔣介石日記》，1943年2月28日。

⁶³ 《蔣介石日記》，1942年6月13日後「上星期反省錄」。

演說，強調「世界人類各民族生命之前途皆決之于美俄英三國之合作」。蔣認為這是艾登「視中國與其他各國為無物。世界人類如依過去英帝國主義侵略之陰謀與其自私自利、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之劣性，若再任其稱霸世界，則人類將無焦類矣。若非美國主持公道者參加此次同盟聯合在內，則中國實羞與為伍」。⁶⁴由此可知蔣對英國的不信任以及信任美國的原因之所在。

6 月下旬，邱吉爾訪問美國。蔣介石認為「此其必有非常之事發生，其或邀加入英俄同盟乎，應特加注意」。⁶⁵6 月 21 日，蔣介石致電宋子文，令其「探詢美國有否參加英、俄同盟之意，並表明我中國之態度」。⁶⁶蔣在這裡所說的中國的態度，就是向美國說明「中國對國際政策，無論軍事、政治皆惟美馬首是瞻，凡美國不參加之事，則中國亦決不願單獨參加，如美國參加之事，則中國亦必須共同參加」。⁶⁷

7 月 20 日，居里抵達重慶，開始了為期半個多月的訪問。在此期間，居里與蔣介石進行了 14 次會談。以往研究，主要關注史迪威問題、美國援華物資問題、中國戰區的地位問題以及緬甸反攻計畫。⁶⁸其時，當時居里為了改善中英關係，曾建議中國與英國之間簽訂類似「英蘇同盟合作互助條約」那樣的協定，卻遭到蔣介石拒絕。⁶⁹

蔣介石之所以拒絕與英國單獨結盟，自有其本身的考量。1942 年 7 月 22 日，蔣在日記中寫到：「英國引誘我與之同盟者，其目的在要求我保持其印度、緬甸之地位，且使印度嫁怨於我也。此為其惟一之陰謀；其次希望我戰後仍承認其在

⁶⁴ 《蔣介石日記》，1942 年 6 月 15 日。

⁶⁵ 《蔣介石日記》，1942 年 6 月 20 日後「上星期反省錄」。

⁶⁶ 《蔣介石日記》，1942 年 6 月 21 日。

⁶⁷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 3 編戰時外交（一）》，頁 156。

⁶⁸ 陶文釗主編，《戰時美國對華政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261-267。

⁶⁹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 3 編戰時外交（一）》，頁 631。1942 年 7 月 21 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到：「見居裡作寒暄語。晚與之詳談美國對印政策後，悉彼此來乃含羅總統之命，調解中英誤解，並試談中英與英俄同盟同性質協定之意，來探余意也。」

南洋之權利，而與我取消不平等條約作交換條件，乃又其次也。此時中英同盟有害無利，應以美國不參加國際性之集團或盟約時，則中國亦不便參加之意，婉詞以拒之為宜。」基於以上考慮，8月4日，蔣介石接見居里時，正式向居里表示「中國決不參加美國不願簽字之任何國際協定，惟美國參加之協定，中國始願為簽字國」。⁷⁰

但是，有關中英同盟的醞釀並沒有結束。1942年10月14日，駐英大使顧維鈞回國述職，抵達重慶。⁷¹11月初，顧維鈞與從美國回來的宋子文就外交政策進行了廣泛的交談，他向宋子文力陳中英結盟的必要性。⁷²其理由主要有以下3點。第一，顧維鈞認為由於英國的海、空軍力量，以及英國駐世界各國使館所採取的總的政治和外交策略，英國戰後仍然會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和實力。而且，英國有一些重要的親日分子，顧維鈞擔心英國戰後會倒向日本。第二，英、美合作和團結符合整個世界的總利益，應該力爭結成中、美、英三國同盟，在戰後的世界中起主導作用。第三，中英結盟將有助於鞏固中國在世界上作為大國的地位。但是，宋子文認為美國不願意看到中國和英國結為盟友，而且中英結盟會破壞中國在亞洲小國中的影響。顧維鈞在重慶期間，先後與王寵惠、孫科、白崇禧、張群等國民黨要人探討了中英同盟問題。其中，只有孫科和白崇禧等人與顧維鈞的觀點一致，其他領導人對中英結盟並不積極。⁷³基於此，顧維鈞認為「推行中英結盟這一主張為時尚早」。⁷⁴

但是，顧維鈞並沒有放棄中英結盟的主張。11月23日，蔣介石與顧維鈞討論中、英關係，顧再次向蔣提出中、美、英結盟的必要。⁷⁵顧認為如果不實現這個目標，中國在戰後就會有陷入孤立的危險。因為「日本的親英、親美分子和英

⁷⁰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3編戰時外交（一）》，頁699。當時，王世杰與王寵惠等曾建議蔣介石向羅斯福表示同意成立中英同盟。參見《王世杰日記》，第3冊，頁335。

⁷¹ 《顧維鈞回憶錄》，第5分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74、91。

⁷² 《顧維鈞回憶錄》，第5分冊，頁104-106。

⁷³ 《顧維鈞回憶錄》，第5分冊，頁102。

⁷⁴ 《顧維鈞回憶錄》，第5分冊，頁106。

⁷⁵ 《蔣介石日記》，1942年11月23日；《顧維鈞回憶錄》，第5分冊，頁120-121。

國的親日分子有可能協同一致來利用英、美之間的自然紐帶」。另外，顧維鈞指出與美國「結成一個一直延續到和平時期的聯盟是根本不可能的」。因為，美國 4 年 1 期總統大選，使其對外政策缺乏連續性。蔣介石同意中、美、英結盟。但是，他認為中國外交方針的基本在於幫助亞洲被壓迫民族獲得解放，如果與英國結盟，會使印度民眾失望。基於這樣的背景，顧維鈞的主張遂不了了之。

1943 年 1 月 9 日，蔣在日記中寫到：「中英同盟提案之婉謝：甲、要求美國參加；乙、要求美國允我中英同盟與中美同盟同時或先後成立；丙、預防俄國妒忌；丁、戰後不能自由行動；戊、美、英防制我戰後與德、倭之聯繫，故決謝絕。」從這則日記可以看出，蔣介石希望與英、美同時結盟，但是又擔心會受到蘇聯的嫉妒。最重要的是蔣擔心戰後不能自由與日本和德國聯繫。1943 年 3 月 7 日，蔣介石致電時在歐洲的桂永清，令其告訴德國情報人員「吾人無力助人，亦無意害人」。蔣希望以此「破除德、倭對我之疑懼」。⁷⁶由此可知，即使在太平洋戰爭時期，中國對德國正式宣戰以後，蔣仍然與德國保持聯絡。這些無疑都是蔣介石獨立自主外交的具體表現。

三、設想戰後國際組織

蔣介石早在 1941 年 5 月底就開始考慮籌備戰後和會問題。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中國國內很快開始關注戰後和會以及建立國際組織等問題。⁷⁷王世杰認為 1942 年 1 月簽訂的「聯合國宣言」之重要性在「使二十餘國一致正式接受了一個和平計畫」。⁷⁸1 月 9 日，王世杰在留英同學會發表題為〈如何重建世界和平〉的公開演講，主張為了保障未來世界和平，應該成立「一個普遍性之世界組織，代替舊有之國際聯盟」。⁷⁹

1942 年 7 月 4 日，國防最高委員會國際問題討論會主任王寵惠提出了一份「國際集團會公約草案」。⁸⁰該草案可以說是國民政府對戰後國際組織的初步構

⁷⁶ 《蔣介石日記》，1943 年 3 月 7 日。

⁷⁷ 參見王建朗，〈大國意識與大國作為〉，《歷史研究》，2008 年第 6 期，頁 128-130。

⁷⁸ 《王世杰日記》，第 3 冊，頁 227。

⁷⁹ 《王世杰日記》，第 3 冊，頁 228。

⁸⁰ 葉惠芬編，《中華民國與聯合國史料彙編：籌設篇》（臺北：國史館，2001 年），頁

想。有關該草案的討論起於何時，蔣介石做過哪些指示，目前尚不清楚。但是，蔣在日記中多次提到審核該草案，⁸¹ 可見蔣對該草案的重視。

「國際集團會公約草案」分析了國際聯盟的弊端，建議廢棄原有盟章，另訂國際集團會公約。關於國際集團會組織之定位，草案指出係「介於國際聯合會與世界聯邦國家或世界統一國家之間，較之國際聯盟，其地位已大見增強」。

該草案就國際聯盟組織之變更以及制度之更革提出了詳細建議。關於如何實行集體安全，建立和平機構，草案提出應該分三步走。第一，大戰結束後，召開和會時，先討論和約，而不及於國際集團會公約。第二，「和約成立後，應由中、英、美、蘇及其他盟國共同擔任和約之執行及戰後和平之保障」。草案特別指出中、英、美、蘇為反侵略之主要國家，對於戰後執行和約，保障和平，責無旁貸。第三，和約成立一兩年後，世界秩序大體恢復，可由中、美、英、蘇發起召集永久和平會議，邀請全世界各國參加，討論集團會公約。

另外，該草案提出國際集團會理事會「由人口最多之八會員國及其他七會員國之代表組織之」。這種以人口因素決定理事會成員的設想，以及中、英、美、蘇為反侵略之主要國家的事實，為日後中國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奠定了基礎。

1943 年 10 月 30 日，中國與美、英、蘇一起簽署莫斯科「四國關於普遍安全之宣言」（以下簡稱「四國宣言」）。⁸² 四國宣言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美、英、蘇四國首次發表的共同宣言。駐蘇大使傅秉常致蔣介石的電報中指出：「我國自加入此次宣言後，已與英、美、蘇三強平等，而居於領導世界政治之地位，對於擊潰敵人及重建世界和平均有莫大關係。」⁸³ 可以說，至此中國真正獲

66-88。另外，國際問題討論會成立於 1941 年，旨在研究國際政治、國際經濟、中日問題及國際自由平等，參見劉曉莉，〈國民政府與敦巴頓橡膠園會議〉，《民國檔案》，2009 年 3 期，頁 117。

⁸¹ 《蔣介石日記》，1942 年 7 月 17 日、7 月 18 日後「上星期反省錄」、7 月「本月反省錄」。

⁸² 有關莫斯科四國宣言之研究，參見西村成雄編，《中國外交と国連の成立》（京都：法律文化社，2004 年），第 2 章。

⁸³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 3 編戰時外交（三）》，頁 812。

得了對英、美、蘇的發言權。四國宣言可以說為 1945 年 10 月聯合國成立提供了理論根據。

四、擬訂處置日本方針

戰後如何處置日本，也是蔣介石戰後構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1943 年 1 月 13 日，蔣思考外交政策應準備之要件，在日記中寫到：「甲、對日本處分之方案與要求條件及方針制定方案，與英、美、俄分別接洽；乙、對日方案之宣傳計畫，領導英、美輿論使不超越我國方案之外」等等。由此可知，在對日處置方面，蔣介石一方面要與英、美、蘇洽商，但是另一方面又要領導英、美輿論。這是蔣介石對日處理的基本方針。

具體來說，對日處置包括領土問題、賠償問題以及日本占領問題。關於領土問題，主要是如何收復東北、臺灣和琉球的問題。關於收復臺灣和東北領土，蔣介石毫無猶豫。但是，對於琉球，蔣的政策有些搖擺不定。⁸⁴

早在 1942 年 11 月，蔣介石曾考慮讓宋美齡與羅斯福商量戰後收復琉球。⁸⁵ 但是，1943 年 11 月，蔣介石準備開羅會議與羅斯福、邱吉爾會談材料時，關於遠東政治提案，蔣提出了以下三點：「(1) 東北四省與臺灣、澎湖應歸還我國；(2) 保證朝鮮戰後獨立；(3) 保證泰國獨立及中南半島各國與華僑之地位。」⁸⁶ 至此，蔣介石不再提收復琉球。關於其理由，蔣的解釋是「琉球與臺灣在我國歷史地位不同，以琉球為一王國，其地位與朝鮮相等，故此次提案對於琉球問題決定不提。」⁸⁷

11 月 23 日，蔣介石與羅斯福會談時，談到領土問題。蔣介石提出「東北四省與臺灣、澎湖群島應皆歸還中國，惟琉球可由國際機構委託中、美共管」。⁸⁸

⁸⁴ 相關最新研究參見王建朗，〈大國意識與大國作為〉，頁 134-137；汪暉，〈冷戰的預兆：蔣介石與開羅會議中的琉球問題〉，《開放時代》，2009 年第 5 期，頁 24-32。

⁸⁵ 《蔣介石日記》，1942 年 11 月 9 日。

⁸⁶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 5 卷（上），頁 431。

⁸⁷ 《蔣介石日記》，1943 年 11 月 15 日。

⁸⁸ 《蔣介石日記》，1943 年 11 月 23 日。

蔣之所以作出這樣的決定，是因為他認為這樣做，「一以安美國之心，二以琉球在甲午以前已屬日本，三以此區由美國共管，比歸我專有為妥也」。由此可知，蔣不想在領土方面引起美國的懷疑，以免影響中美關係。這與前文所述蔣多次表明不以亞洲領袖自居有密切的關係。

這一點，在對日處置問題方面也可以看出來。11 月 17 日，蔣在日記中寫到：「對日處置提案與賠償損失等事，當待英、美先提，切勿由我主動自提。此不僅使英、美無所顧忌，而且使之畏敬，以我乃毫無私心於世界大戰也。」

開羅會議前夕，爲了與美、英首腦商談戰後計畫，國民政府擬定了政治方案。⁸⁹該方案由 4 部分組成，分別爲：（一）關於設立四國機構或聯合國機構問題；（二）關於過渡期間國際安全問題；（三）關於德國投降問題；（四）關於遠東之問題。其中，戰後對日政策主要集中在第（四）部分。而（四）又包括以下 4 個問題。分別爲：（一）遠東委員會問題；（二）統一作戰問題；（三）日本領土暨聯合國領土被戰領克服時之臨時管理問題；（四）日本潰敗時對日處置問題。

11 月 23 日，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王寵惠與郭斌佳將政治方案提交蔣介石。蔣介石認爲方案中所提全部建議，難以在開羅會議一一得到落實。所以，蔣決定就「具體問題作直截了當之提議」。⁹⁰具體包括：「凡爲清算日本侵略行爲，及足以明顯表現我國六年來之作戰目的者，決在此次會議中與英、美成立確切之諒解，並昭示於天下」。經過與羅斯福會商，中美雙方一致同意下列各點：（一）日本攫取中國之土地應歸還中國；（二）太平洋上日本所強占之島嶼應永久予以剝奪；（三）日本潰敗後，應使朝鮮獲得自由與獨立；（四）戰後日本在華公私產業應完全由中國政府接收。⁹¹12 月 1 日，中、美、英三國首腦發表聯合公報（開羅宣言），明確指出：「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臺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⁹²蔣介石收復失地的夙願終於獲得保障。

⁸⁹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 3 編戰時外交（三）》，頁 525-527。

⁹⁰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 3 編戰時外交（三）》，頁 527。

⁹¹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 3 編戰時外交（三）》，頁 527-528。

⁹²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 3 編戰時外交（三）》，頁 546。

除了上述問題以外，11月23日，蔣介石與羅斯福還討論了與日本有關的幾個問題。⁹³（一）日本未來之國體問題。當羅斯福就戰後天皇制之存廢問題徵求蔣介石意見時，蔣介石回答說：「此次日本戰爭禍首，實只幾個軍閥，應先將軍閥打倒。至於國體問題，宜由日本人民自己解決，以免構成民族間永久之錯誤。」（二）日本對華賠償問題。蔣介石建議由日本以工業機器、軍艦、商船、鐵路、車頭等實物抵償，羅斯福表示同意。（三）關於日本投降後對其三島駐軍監視問題。羅斯福希望中國居於領導之地位，但是蔣介石以中國尚乏擔當此任務之力量，主張「應由美國主持，如需要中國派兵協助亦可」。蔣介石認為羅斯福讓中國負責對日本軍事占領，「有深意存也」，所以「亦未便明白表示可否」。蔣在這裡所說的「深意」具體指什麼，蔣在日記裡沒有明確記述。筆者認為，蔣懷疑羅斯福是在試探蔣對日本是否有領土野心，因此，拒絕當占領日本的急先鋒。

開羅會議結束後，蔣介石對開羅之行作出如下總結：「本周在開羅逗留共為七日，乃余登外交舞臺之第一幕也。其間以政治之收穫為第一，軍事次之，經濟又次之，然皆能獲得相當成就，自信日後更有優美之效果也。……東三省與臺灣澎湖島為已經失去五十年或十二年以上之領土，而能獲得美、英共同聲明歸還我國，而且承認朝鮮于戰後獨立自由。此何等大事，此何等提案，何等希望，而今竟能發表於三國共同聲明之中，實為中外古今所未曾有之外交成功也。……以將來和平會議中關於我國最艱難之問題、最重大之基礎，皆於此開羅會議之數日中，一舉而解決矣」。⁹⁴「開羅宣言」發表以後，蔣介石認為「此乃為國家百年來外交上最大之成功，又為勝利重要之保障，是三十年苦鬥之初效也」。⁹⁵

1943年底，蔣介石回顧一年來外交方面所發生的大事，發出了以下的感慨。「本年自一月英、美平等新約訂立，乃至美國會對華限制移民律撤銷案之通過，以及開羅公報東三省與臺灣歸還中國，加之戰後朝鮮獨立之聲明以後，我國次殖民地之地位與百年來所受之國恥與污辱已一筆勾消，掃除盡淨。然而，欲求得真正平

⁹³ 《蔣介石日記》，1943年11月23日；梁敬錚著，《開羅會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10月4版），頁111-112。

⁹⁴ 《蔣介石日記》，1943年11月28日後「上星期反省錄」。

⁹⁵ 《蔣介石日記》，1943年12月「本月反省錄」。

等與獨立自由之地位，非在此後二十年內加倍努力與奮鬥，則尚難取得也。」⁹⁶ 蔣當時的心情，也許可以表述為「革命尚未成功，建國仍需努力」。

伍、結語

本文主要分析了 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至 1943 年開羅會議結束這一段時期蔣介石的戰後構想。蔣的戰後構想分為內政和外交兩個方面。內政方面，蔣首先考慮的是收復失去的領土。具體來說，有東北、臺灣和澎湖列島。關於外蒙、西藏和新疆，由於涉及與蘇聯和英國的關係，這一時期除了新疆外，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蔣本來打算收復琉球，但是由於琉球的性質，以及為了不讓美國懷疑中國有領土擴張的野心，蔣介石決定放棄收復琉球。蔣介石關於國家建設的構想具體表現在《中國之命運》裡面。政治方面，蔣介石決定於戰後一年之內，召集國民大會，頒布憲法，實行憲政。為國民政府政治發展定下了時間表。關於國防方面，這一時期蔣所考慮的是守勢國防，其假想敵就是蘇聯。出於這樣的考慮，蔣介石希望戰後定都西安。

蔣介石關於外交方面的戰後構想主要包括四個方面。第一，擬定「太平洋憲章」，積極支援亞洲被壓迫國家獨立。蔣介石之所以積極支持亞洲被壓迫國家獨立，與他的反帝意識以及其黃、白人種鬥爭意識有密切關係。同時，也是為了實現孫中山提倡的國民革命理念。第二，拒絕與英國單獨同盟，惟美國馬首是瞻。蔣介石反對英國殖民主義，這一點與羅斯福的理念是相同的。同時也是蔣介石相信羅斯福的最大理由。第三，提出戰後國際集團會構想。該構想主張中、美、英、蘇應該負責戰後處理問題，還提出國際集團會理事會應該由人口最多的 8 個成員國組成。這些主張為日後中國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提供了有利條件。第四，如何處置日本的問題。開羅會議確定日本戰後將東北、臺灣和澎湖列島歸還中國，獲得了收復領土的保證。關於天皇制的存廢，蔣介石建議由日本人民自己決定，避免了日本國體發生重大變化。在此，還有一點值得注意，即蔣介石認為

⁹⁶ 《蔣介石日記》，「三十二年感想與反省錄」。

中日戰爭是由軍閥引起的。這一觀點，與共產黨的「戰爭責任二分法」是相同的。

綜觀這一時期蔣介石的戰後構想，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三點特徵。第一，守勢國防與「自強」之夢。蔣介石在日記裡經常流露出對英、美、蘇的不滿，發誓要自強。1943年3月28日，蔣在日記中寫到：「我中國一日不能自強，則任何帝國主義亦一日不能消滅。如此，人類永無自由解放之日。惟有中國自強，則任何帝國主義皆不能存在」。蔣介石積極主張收復失土與恢復主權，但是卻三番五次表示不以亞洲領導自居。這令人想起20世紀80年代末鄧小平所提倡的「韜光養晦」外交戰略。由此可以看出20世紀中國外交戰略的連續性。

第二，蔣介石有著濃厚的亞洲情結。蔣積極支持亞洲弱小國家獨立，甚至對於戰時加入軸心陣營的泰國，也希望幫助其戰後獨立。對於給中國帶來巨大損失的日本，也主張寬大處理。由此可以看出蔣作為中國領導人的博大情懷。

第三，蔣介石在摸索一種獨立自主的全方位外交戰略。1942年9月12日，蔣在日記中寫到：「此時我國應有獨立自主之道。只要我能自強奮鬥，則美國之態度善惡，皆無足輕重。國際道德至今，可謂喪失殆盡，殊為人類正義寒心也」。蔣介石拒絕與英國單獨結盟，一方面因為蔣對英國不信任，另一方面，他擔心會引起蘇聯嫉妒，也怕影響戰後與德國和日本發展關係。這些無疑都是蔣介石獨立自主外交的具體表現。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蔣介石的外交戰略具有前瞻性。

徵引書目

一、檔案、史料彙編

《蔣介石日記》（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所藏）。吳景平、郭岱君編，
《宋子文駐美時期電報選（1940-1943）》。上海：復旦大學

出版社，2008 年，初版 1 刷。秦孝儀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
抗戰時期第 3 編戰時外交（三）》。

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 年，初版。
秦孝儀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 4 編戰時建設（二）》。

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8 年，初版。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 5 卷（上）。臺北：中央文物供
應社，1978 年，初版。

榮孟源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下冊。北京：光明日
報出版社，1985 年。

蔡盛琦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 45 冊。臺北：國史館，2010 年，
初版 1 刷。

二、文集、回憶錄、訪談錄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 4 卷。臺
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 年。

王世杰，《王世杰日記》，第 4 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年。

葉惠芬編，《中華民國與聯合國史料彙編：籌設篇》。臺北：國史館，2001 年。

顧維鈞，《顧維鈞回憶錄》，第 5 分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

三、專書

西村成雄編，《中国外交と国連の成立》。京都：法律文化社，2004 年。和

田春樹等編，《岩波講座 東 アジア 近現代通史第 6 卷 アジア太平洋戦争と

- 「大東亞共榮圈」1935-1945年》。東京：岩波書店，2011年。
- 松村史紀，《「大中国」の崩壊——マーシャル・ミッショからアジア冷戦へ》。東京：勁草書房，2011年。
- 段瑞聰，《蔣介石と新生活運動》。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06年。
- 梁敬錚，《開羅會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10月，4版。
- 陶文釗編，《戰時美國對華政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年，初版。
- 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
- 鄧野，《民國的政治邏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

四、期刊論文

- 井上久士〈中國の戰後構想——中國國民黨と中國共產黨〉，《近きに在りて》，第30號（1996年11月）。
- 王建朗，〈大國意識與大國作為〉，《歷史研究》，2008年第6期。
- 王建朗，〈試論抗戰後期的新疆內向：基於《蔣介石日記》的再探討〉，《晉陽學刊》，2011年第1期。
- 汪暉，〈冷戰的預兆：蔣介石與開羅會議中的琉球問題〉，《開放時代》，2009年第5期。
- 周開慶，〈記中央設計局物質建設五年計劃草案〉，《傳記文學》，第27卷5期（1975年11月）。
- 段瑞聰，〈1942年蔣介石訪問印度之分析〉，《民國研究》，總第16輯（2009年12月）。
- 段瑞聰，〈蔣介石の第三期國民革命中心理論〉，慶應義塾大學日吉紀要《中国研究》，第4號（2011年3月）。
- 家近亮子，〈中國の抗日戰爭と戰後構想〉，收入和田春樹等編，《岩波講座 東アジア近現代通史第6卷 アジア太平洋戰爭と「大東亞共榮圈」1935-1945年》。東京：岩波書店，2011年。
- 張希哲，〈記抗戰時期中央設計局的人與事〉，《傳記文學》，第27卷4期（1975年10月）。
- 劉維開，〈國防最高委員會的組織與人事初探〉，收入胡春惠主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香港：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心，

1996 年。
劉維開，〈國防最高委員會的組織與運作〉，《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 21 期（2004 年 5 月）。劉曉莉，〈國民政府與敦巴頓橡膠園會議〉，《民國檔案》，2009 年 3 期。